# 從運動平權到運動外交：全球女性與運動高峰會的觀察與台灣的國際角色

●姜穎／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教授、台灣運動社會學會副理事長、中華奧會性平委員

盛夏中，英國伯明罕（Birmingham）迎來史上第九屆「國際女性與運動工作小組高峰會」（IWG Global Summit on Women and Sport）。這是全球最大運動性別平權盛會，受到國際奧會的支持。根據國際女性與運動工作小組（IWG）官網資料，三天的議程聚集來自全球八十多個國家超過千名與會者。中華奧會也組成九人團體出席，性平委員會副主委劉柏君受邀擔任「超越變革：國際女性與運動的下一步」的論壇講者，筆者也是隨團成員之一。

## IWG：國際女性與運動工作小組

IWG是什麼？「國際女性與運動工作小組」（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Women and Sport），1994年5月，英國布萊頓（Brighton）舉行「女性、運動與變革的挑戰」（Women, Sport and the Challenge of Change）研討會，這場由當時英國運動理事會（British Sports Council）主辦，國際奧會（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，簡稱IOC）協辦的活動，吸引了來自全球八十餘國，超過二百八十位的與會者。會議的成果之一即成立IWG，並提出「布萊頓宣言」（Brighton Declaration on Women and Sport），成為女性全方面參與運動的基石（Fasting, Sand, Pike & Matthews, 2014）。

英國Hertfordshire大學教授Elizabeth Pike，為國際知名運動社會學者，同時是2024年IOC運動性平、多元及包容獎（GEDI）的全球獎項得主。她在2024年出版，回顧IWG成立三十年里路的書中提到，1990年代，IWG草創階段，適逢冷戰與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、網路發明以及第三波女性主義的浪潮，人類的歷史面臨重大的挑戰和動盪／擾動（turmoil）。為了尋求改變，IWG創立的目標即是帶來「正面的擾動」（Pike, 2024）。

首先，從組成層面來看，IWG有別多數的團體，它自始就不是一個有著會員制的「組織」（organisation），而以「網絡」（network）的方式存在。此舉乃是希望能超越傳統、男性主導的運動治理模式。讓更多政府、非政府團體、運動委員會、高教組織、國家／國際運動組織參與其中。同時，IWG致力於（當時）「不討好」的議題，包含女性領導人數不足、性騷擾、性暴力等女性運動參與相關困境（這些議題時至今日仍是許

多國家社會運動治理的重要挑戰，包含台灣）。

IWG的宗旨，乃是期勉自身成為全球最大，致力於增進運動、體育以及身體活動中性別平權與平等的網絡，透過運動賦權女性。IWG的主要活動在於倡議女性與運動議題、監督全球女性與運動的進程，並舉行四年一次的高峰會。每四年，IWG秘書處擇定下一屆主辦國，期望透過峰會的舉行，帶動全球各區域，女性運動參與的行動、能見度以及制度性的改革（Pike, 2024）。

第一屆的IWG峰會在英國的布萊頓（Brighton）舉行，主題是「變革的挑戰」（The Challenge of Change）由（表1）可見，在運動場域針對女性的運動實踐倡議、推動「變革」，長期以來是IWG的使命與宗旨，時至本屆伯明罕峰會，大會主題「突破之後」（Beyond the Breakthrough），則將三十年來的成果，再往前推進一步，強調不僅要破除女性參與運動的阻礙，更要建立長遠的變革。目前僅有南美洲尚未舉行過IWG峰會，2030年的大會將在巴西里約熱內盧（Rio de Janeiro）舉行。由參與人數與參與國家數來看，IWG已是全球性的（運動）性別平等盛會。

表1、IWG歷屆資料

| 年代 | 地　　點 | 主　　題 | 參與人數 | 國家數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1994 | 英國Brighton |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| 284 | 84 |
| 1998 | 納米比亞Windhoek | Reaching Out for Change | 400 | 74 |
| 2002 | 加拿大Montreal | Investing in Change | 550 | 97 |
| 2006 | 日本Kumamoto | Participating in Change | 700 | 100 |
| 2010 | 澳洲Sydney | Women: Play, Think, Change | 500 | 58 |
| 2014 | 芬蘭Helsinki | Lead the Change – Be the Change | 800 | 100 |
| 2018 | 波札那Gaborone | Determine the Future, Be Part of the Change | 926 | 81 |
| 2022 | 紐西蘭Auckland | Change Inspires Change | 1850線上加實體 | 90 |
| 2026 | 英國Birmingham | Beyond the Breakthrough | 1200 | 80 |
| 2030 | 巴西Rio de Janeiro | | | |

資料來源：Pike, 2024。

## 峰會觀察與反思

基於「網絡」的特性，IWG出席者具有高度的多樣性。包含國際運動組織成員、政府官員、草根倡議行動者、跨國企業、運動員以及學術工作者。贊助廠商則包含了寶橋（Procter & Gamble）、渣打銀行（Standard Chartered）、英國天空廣播集團（Sky）以及英國女性運動參與推動組織This Girl Can等，足見運動性別平權議題在全球的重要性，已眾聲喧嘩，深化至各領域的相關實踐中，以營利為核心的跨國企業與主流媒體集團，都

不能自外於其。檢視本次台灣的團隊成員分別來自運動治理單位（中華奧會）、國際體育團體、運動外交與性平倡議團隊、運動員以及學界，相當程度反應了IWG組成的多樣性與網絡特質。

筆者作為台灣運動研究場域中長期處於「邊緣」的性別研究者，這實在是一個很令人振奮的場合，首日議程，於伯明罕國際會議中心可容納三千人的會議廳展開，以IWG主席（同時為英國奧會副主席）Annamarie Phelps的演講開始。她以甫結束的女子T20板球世界盃（ICC Women's T20 World Cup 2026）決賽門票收益達一百萬英鎊，創下女性板球賽事的歷史紀錄，展望運動場域的性平進程。除此之外，Michele Kang（全球首個完全投入女子足球的多俱樂部組織，Kynisca Sports International之創辦人）的爐邊談話，又或是集合了Amanda Staveley（PCP Capital Partners 執行長）、Maggie Murphy（Aston Villa women FC常務董事）與Sally Horrox（Women's Rugby at World Rugby理事長）的論壇，談到女性運動何等重要且充滿前景與商業競爭力。這些豐碩且主要來自於西方社會的成果，營造出一個運動性平烏托邦的進步氛圍。

然而，當目光轉向「全球南方」以及各基層運動的性平實踐時，我們仍然可見更多掙扎與得來不易的成果。當2025年IOC性別平等、多元與共融獎（GEDI）得主，前印度男子國家排球隊隊長Abhijit Bhattacharya致詞時，無人不為他在印度偏鄉女子運動推廣的經驗動容。眾多與會者中，國際奧會主席Kirsty Coventry無疑是重要講者，她細數奧會的性平成果，提到2030將迎來人類第一個性別平等的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（Alpes 2030），並強調女性在教練、領導決策階層的強化會是國際奧會未來的方向。世界田徑總會主席Sebastian Coe亦詳述女子田徑運動的發展歷史，強調這花了「一整代人的努力」，強調將由「公平競爭」轉往「公平教練／領導」的目標前進。三天議程中，「女子運動不是慈善事業」、「同理心（empathy）是新的超能力」、「女人要以自己的方式領導」、「將運動員置於決策的核心」等概念不斷被提起，是與會者的相互打氣，但我想，也是對於那些尚未加入運動與性平推動，甚至抵抗的個人與團體，所做出的呼籲與提醒。

然而，如同Pike（2024）的論述，當IWG跨入三十週年之際，人類社會面臨了更大的改變以及動盪，影響了女性的運動參與。無論是地緣政治的緊張、戰爭、被迫移民、氣候變遷、疫情，以及正在持續中有關性別認同、運動參與資格的爭議。這使得IWG涉入了第四波女性主義關切的議題，例如賦權、交織性（intersectionality）和數位社群（digital communities）的議題。

許多與會者好奇，在此鼓舞性別平權與包容的場合裡，Coventry或是Coe將如何面對性別檢測、參賽資格相關議題的批判與提問。然而，和會中所有專題演講一樣，他們沒有接受觀眾提問。此外，兩人都在女人、女孩運動參與和包容的討論中，強調「生理女性」的概念。Coe主張，對於性別發展差異（DSD）選手的相關政策有著紮實「科學真實」做為基礎。

高峰會進入第二日，奧運的基因檢測議題登場，論壇「先驗後上：科學、政治與代價」（Tested to compete: The science, the politics, and the price），由容納三千人座席的主舞台，移動到位於地下室的空間中展開，仍聚集滿場關心這個議題的聽眾。與談人包含Alun Williams是曼徹斯特城市大學（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）運動基因體學（Sport and Exercise Genomics）教授、社會學家／田徑選手Madeleine Pape以及女性運動團體Women in執行總監Maria Bobenrieth等人。Pape提醒聽眾「應該對科學充滿好奇」，意味著人們應該要常常「問科學（家）問題」，保持好奇與猜疑，因為「所有的科學都有侷限」。Williams描述既有的許多「科學真理」，被用來證成奧會性別檢測的那些「證據」，許多是明顯有誤（outstanding poor evidence），他提供了數則反證。最後，Bobenrieth提醒我們思考「**當（女性運動員）性別檢測成為政策之後，如何影響了日常生活裡的運動實踐**」他提到，以草根運動為例，「極大化參與」和「創造安全的環境」是最重要的事，這樣的政策（雖然在精英運動端）會產生什麼傷害/影響必須被關注。「人應該被置於政策之前」，「運動不必然具有包容的特性，是有人挑戰了既有規範，使它成為包容的場域」，我們要思考「科學不一定是中立，也不一定正義」。這場論壇，在三日的會議中，揭開了當前運動與性別場域中，仍有待持續辯證與挑戰的議題。

## 運動與性別平權：台灣的國際角色觀察

如前所述，台灣無任所大使劉柏君在這次峰會中，受邀出席擔任「超越變革：國際女性與運動的下一步」（Beyond the Breakthrough: What's Next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men and Sport Movement？）的論壇與談人。論壇上，劉柏君從身為「台灣第一位女性棒球裁判」一路所遭遇的困境談起，除了相較於男性同儕，得加倍努力，證明棒球專業之外，面對結構、制度的不友善，她經歷霸凌、性別暴力到球場空間設計的女性排除與不正義：「（曾）因為球場沒有女廁，母親買尿布給我穿，我才能上場執法」。在這些阻礙與惡意中，她創立兩個非政府組織（台灣運動好事協會、台灣女子運動體育協會），啟動導師計劃和安全保障措施。推行五年後：她們服務的第一代女孩中有80％入選國家青年隊，且有80％獲得了大學運動獎學金。有關這場論壇的新聞報導有許多，《中央社》亦有記者到場採訪，但即使是今日，本文再度回顧當天場景，讀者們仍然很難僅透過文字，感受到當日劉柏君在現場所喚起的共鳴與同理力量之大與震撼人心。這也凸顯了IWG的國際外交意義，除了政策與績效，圍繞在人身上的生命經驗以及性別權力鑿痕，往往最具有力量，是開啟理解、對話與合作的基礎。論壇結束後，劉柏君花費超過半小時，才從會議廳走到議場外，沿途都是向她致意的國際與會者。會後，劉柏君大使告訴《中央社》，「在運動性別平權領域，台灣應有野心成為國際級的決策者與領導者，而不僅是『參與』或『響應』」。峰會中，不少人問我們「台灣準備好申辦IWG了嗎？」（陳韻聿，2026年）。

日本學者小笠原悅子（Etsuko Ogasawara），目前是IWG執委會亞洲代表同時也是

2006年熊本IWG峰會的共同主席。她也是日本女子運動協會（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Women in Spor，簡稱 JWS）的創辦人與執行董事。她在Pike（2024）的專書中提到自身在日本運動領域推動性別平權與申辦IWG的經驗。年輕時是游泳教練的她，十分渴望擔任奧運教練，但男性同儕告訴她「身為女人，妳只能是陪同人員（chaperone），（國家級）教練是男人的工作」（Pike, 2024）。

日本大型廣告公司博報堂（Hakuhodo）的支持與合作關係，在1999年Ogasawara開始啟動申辦熊本IWG的過程中，扮演重要的角色。除了這個商業夥伴之外，她特別提到，當時日本奧會（Japanese Olympic Committee，簡稱JOC）正試圖申辦2008大阪奧運。然而以失敗告終。小笠原利用這個機會，建議日本奧會「是時候開始擘畫性別平等或女性參與運動的倡議了！」最後，JOC加入，與JWS以及熊本地方政府、公民團體，共同完成2006熊本IWG峰會的舉行，成為亞洲國家的首例（Pike, 2024）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這次峰會的主要成就是「將女性運動納入日本法律，亦即日本的運動政策」，在此之前，日本基本運動計劃（Japan Basic Sport Plan）並未提及女性或是兒童。峰會後，小笠原受邀出席日本全國委員會議（National Committee Meeting），演說中提到「在實現平等之前，我們需要女性或女孩這個詞來推動女性參與運動」（until achieving equality, we need the word women or girls to promote women in sports）。這些努力累積到2019年，日本頒布「運動治理準則」（Sports Governance Code），為每個體育協會設定了目標，確保理事會成員中有40%為女性，25%則需為非運動界人士。任何未能達成目標的國家運動組織「必須在網站上說明原因及改進方式」（Pike, 2024）。

日本的經驗，或許可為台灣帶來借鏡與思考。運動性平推動的道路上，國際社會的性平變革與支持，具備高度轉換成促發國內改革的動力。這亦是台灣性別平等推進的歷史經驗。1971年之後，台灣便無法參與聯合國性別政策發展的過程。1997年再行成立的「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」（婦權會），2003年引入了性別主流化的概念，「國際接軌」自始就是重要的政策前提。2012年，行政院婦權會改制為「行政院性別平等會」（行政院性平會），增設直屬院長的性別平等處（性平處）為執行單位。基於台灣特殊的國際處境，人權和性別平等成為爭取國際認同的策略。形成一種「由上而下」推進的性別平等運動，即國家女性主義state feminism（顧燕翎，2020）。如同陳瑤華（2003）曾在「性別主流化：2003國際婦女論壇會議實錄」中提出以下的觀點：

> 台灣必須努力使人權、性別主流化等關鍵的基本政策和法律，帶入國際的公約和協定，接受國際標準的檢視。那麼，就算受到其他國家無理的杯葛時，至少還可以形塑出民主與正義受到蔑視的無辜形象，尋求國際公民社會的支持。

劉柏君大使在受訪時提到：「出席IWG峰會的人士多為各國或國際組織決策者或領導者，峰會決議對各國或國際組織的政策、制度與文化影響力不容小覷」。此外，由於

中國多年來在IWG缺席，使得IWG「對台灣友善」減少了阻力。此次全程台灣代表均以Taiwan名義參與活動，無需屈就Chinese Taipei（中華台北）（陳韻聿，2026年）。這也顯示更積極參與乃至於申辦IWG峰會，對台灣具有雙重的意義：首先。對內無疑是促進運動性別平權的催化劑，由上而下、由外而內，透過國際社會的性別平等進程來督促、提醒對於性平改革仍然保守遲疑的台灣運動領域。對外，則無疑是台灣建立國際角色的契機，台灣目前已有二十九個相關組織簽署了「布萊頓與赫爾辛基宣言」（Brighton plus Helsinki Declaration），國際名列前茅。除此之外，區域內，本次峰會也有許多東南亞、南亞的代表，表達了對於台灣（運動）性別平權進程的肯定，台灣有機會成為領導區域運動性平進程的先驅之一。

國家女性主義（state feminism），即「婦女團體在國內爭取婦女參政，參與公共決策和資源分配，也利用超越國家的國際組織（全球性如聯合國、區域性如歐盟）來推展婦女運動」（顧燕翎，2020，439頁）。然而，面對國家女性主義形式，台灣的性別研究者提出提醒與批判（成令方，1996；李元貞，2014），她們認為女性主義者「若只積極介入國家機器的權力中心，而沒有草根婦運的邊緣戰鬥是件可怕之事」。顧燕翎（2023）評論台灣「有性平卻無女性主義」，認為台灣避談女性主義的性別主流化，不夠重視價值與倫理，主要依靠法律、制度和訓練來「防治」例如性騷擾等議題。因此，建立更豐富、深刻的運動與性別研究，厚實台灣經驗研究與理論基礎，和具體、經得起檢驗的具體運動與性平政策同樣重要。台灣至今尚未有如JWS的運動與性別組織亦或是學術研究單位，例如日本成城大學（Seijo University）的「國際運動與性別平等研究中心」（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Sport and Gender Equality）等均是台灣良好的典範。

最後，本屆IWG主題「超越突破」（Beyond the Breakthrough），強調不僅是要破除女性運動參與的阻礙，更要建立長遠的改變。這樣的改變，除了行動，更重要的是心態（mindset）和信念的變革。而這，往往最為困難。益普索（Ipsos）英國與愛爾蘭公共事務總經理（Managing Director of Public Affairs）Trinh Tu提到，在國際政治充滿變動的時代，區域風險提高，改變了人們對於「改變」的態度。在新科技、新權力與根深蒂固的分歧中，人們渴望「不變」形成了一種危機，也是性別平權的挑戰。儘管回顧過去這幾年，女性運動收益（在西方）大幅提升，女性運動不再是小眾運動（niche sport），但運動場域外的態度真的改變了嗎？她提及一份2025年3月發布的調查報告，全球三十個國家中，對於性別平等的態度「認為女性平權運動發展已經太超過」的比例達到五成，甚至主張「提倡女性平權太超過，以至於男人受到歧視」的比例也達到四成，特別是Z世代的男性，對這些觀點抱持著更強烈的想法。這或許是在三日的運動性平歡慶盛會後，與會者持續警戒與挑戰之所在。

這次高峰會在伯明罕舉行，這個城市，是英國樂團黑色安息日（Black Sabbath）的

故鄉，被視為重金屬音樂的原鄉。峰會會場ICC（國際會議中心）所在的運河畔，立有黑色安息日長凳（Black Sabbath Bench），紀念包含「工人階級英雄」（Working Class Hero）Ozzy Osbourne在內的樂團成員。若重金屬音樂是人類文化歷史上最陽剛的，對於階級、品味秩序的擾動，那麼數步之遙外的IWG全球峰會，則是不遜於其，在這三十年間，by women, for women, with women，針對全球運動場域中的性別秩序，所進行的強烈擾動，而這個擾動，仍然持續著。

## 【參考文獻】


Fasting, K., Sand, T. S., Pike, E., and Matthews, J., 2014. *From Brighton to Helsinki: Women and Sport Progress Report 1994-2014*. Finnish Sports Confederation Valo.

Pike, E., 2024. *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Women and Sport 1994-2024: The Challenge of Change*. Routledge.

李元貞，2014。《眾女成城：台灣婦運回憶錄（下）》。女書文化。

成令方，1996。〈改造國家機器比國家認同更急切〉，《騷動》，第 2 期，頁 84-90。

陳韻聿，2026/7/12。〈劉柏君：運動不僅為奪牌　台灣應期許成為國際決策者【專訪】〉，《中央社》。

陳瑤華，2003。〈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等建制〉，《性別主流化：2003 國際婦女論壇會議實錄》。財團法人婦女權益發展促進基金會，頁 58-61。

顧燕翎，2023。〈台灣#METOO 運動為何遲到〉，《新新聞》。<https://www.storm.mg/article/4828079#page1>。

顧燕翎，2020。〈由上往下推動性別平等：國家女性主義〉。《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》（完整修訂版）。貓頭鷹出版社，頁435-470。◆